

安全約束下的雙層政治市場： 台灣分裂投票現象的一個理論視角

李林杰^{1*}

摘要

台灣近二十餘年的選舉經驗呈現出一種相對穩定的分裂投票現象：在地方選舉中泛藍陣營較具優勢，而在中央層級選舉中泛綠陣營往往勝出。既有研究多分別從地方派系、治理績效或身分政治等角度加以解釋，但較少在同一分析框架中整合地方治理邏輯與安全—身分政治之間的互動關係。台灣在持續的外部安全壓力下，政治體內部的公共需求分化為兩類相對不同的競爭領域：一是以公共服務與行政績效為核心的治理需求，主要體現在地方層級政治；二是以政治安全與集體認同為核心的安全—身分需求，主要體現在中央層級政治。在此情境下，政黨在不同政治市場中，形成差異化的比較優勢；而選民亦在不同選舉情境中，採取不同的議題權重，進行政治選擇。本文提出「安全約束下的雙層政治市場」新概念，嘗試從外部安全環境與內部政治競爭結構互動的角度，為理解台灣「地方藍、中央綠」的分裂投票現象，提供理論視角。

關鍵字： 台灣政治； 分裂投票； 政治市場學； 中央與地方關係

1 *四川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聯培博士生；四川省台灣研究中心研究員。
收稿: 2026 年 3 月 14 日。 同意刊登: 2026 年 3 月 21 日。

壹、導論：安全約束下的分裂投票之謎

在多數成熟的民主政治體中，選舉往往被視為對同一政治競爭空間的週期性表達（Campbell et al., 1960, pp. 121-158）。政黨通常圍繞一組相對穩定的議題與價值分歧展開競爭，選民則根據自身相對固定的意識形態偏好，在不同政黨之間作出選擇。此種選擇傾向往往在多個選舉層級上保持大體一致，例如在地方選舉中支持的政黨，在全國性選舉中亦傾向於維持相同陣營。此種「一致投票」（straight-ticket voting）模式被視為民主政治的經典特徵，體現了選民對政黨整體立場的認可（Lewis-Beck et al., 2008, pp. 19-42）。

然而，台灣近二十餘年的選舉經驗卻呈現出一種顯著偏離此一經典模式的現象。自 2010 年代以來，台灣的地方選舉與中央層級選舉之間形成了高度穩定的結果分化（游清鑫，2004，頁 47-98）：在縣市長選舉、地方議會選舉等基層層面，泛藍陣營（以國民黨為核心）往往取得較為明顯的優勢，能夠動員基層組織、地方派系和資源分配網路，贏得多數席位；而在領導人選舉及部分全國性選舉中，泛綠陣營（以民進黨為核心）則連續取得勝利。此種「地方藍、中央綠」的結構並非偶發事件，而是在 2012 年、2016 年、2020 年乃至後續選舉週期中反覆出現，構成了台灣民主政治中一種具有制度性與結構性特徵的分裂投票（split-ticket voting）模式（王業立、彭怡菲，2004，頁 3-45）。

此種現象的持續性令人注目。舉例而言，在地方選舉中，國民黨憑藉長期深耕基層的派系網路、地方建設資源和動員能力，往往能在縣市層面占據上風（黃秀端，2006，頁 181-190）；相反，在領導人選舉中，民進黨則憑藉對國家認同、兩岸關係與安全議題的強勢論述，持續吸引多數選民支持（吳玉山，1997，頁 259-280）。此種分化並非短期波動，而是跨越多個選舉週期的穩定格

局，挑戰了傳統政黨競爭理論中「單一維度競爭空間」的假設（Evans & Whitefield, 1993, pp. 521-548）。因此，本文試圖回答一個核心問題：為何在同一選民群體與民主制度之下，台灣的地方選舉與中央選舉會長期呈現穩定而持續的分裂投票模式？

既有研究對此一現象提出了多種解釋路徑。首先，一類學者強調地方派系與組織動員能力。其指出，國民黨在威權時期長期掌控基層行政資源，積累了龐大的地方網路與利益交換機制，使其在縣市長選舉等「治理導向」的競爭中更具優勢。地方選舉往往聚焦於基礎設施、經濟發展、福利分配等具體績效議題，國民黨在這些領域的基層滲透力較強，能夠通過派系動員與服務交換維持支持。其次，另一類研究從身份政治與兩岸關係角度切入，認為領導人選舉高度圍繞國家認同、主權爭議與安全風險展開。民進黨在「台灣主體性」與「抗中保台」議題上擁有更強的議題主導權，能夠有效激發選民的集體焦慮與認同感。此外，還有學者關注候選人個人魅力、競選策略差異、世代結構變遷（如年輕世代更傾向綠營）或經濟表現等因素。這些解釋雖各有洞見，但往往局限於單一選舉層級的分析，難以同時解答核心疑問：為何同一選民群體會在不同選舉中持續支持不同陣營？此種分化為何能夠長期維持穩定，而未收斂為單一政黨全面優勢或典型的左右翼交替競爭結構？

基於此，本文並不試圖對台灣分裂投票現象提供完整的經驗解釋，而是嘗試提出一個概念性理論框架，以理解在持續安全約束條件下政治競爭結構可能出現的分層化趨勢。本文認為，要深刻理解台灣的分裂投票現象，必須超越將政治競爭視為單一、統一空間的傳統假設。台灣所處的特殊國際結構——持續的外部安全壓力、未解決的主權爭議、高度國際化的戰略環境以及地緣政治的

結構性不確定性——使得內部政治需求在本質上出現根本分化（林繼文，2005，頁 67-104）。一方面，社會成員需要高效的公共治理、經濟發展與日常生活保障，此類需求強調績效、資源分配與地方管理；另一方面，政治體又必須持續回應長期存在的安全風險、國家認同焦慮與外部威脅。這兩類需求在風險結構（地方 vs. 全球）、時間維度（短期績效 vs. 長期存續）與責任層級（地方 vs. 中央/國際）上高度不同，且難以相互替代或完全整合。此種需求的分化推動政治競爭自然分裂為兩個相對獨立的領域，從而塑造出獨特的選民行為模式。

需明確的是，本文所使用之「安全約束」（security constraint），並非單純指一時性的安全危機（security crisis）或主觀性的安全憂慮（security concern），而是指一種持續性、結構性的外部威脅環境，其通過長期不確定性與潛在風險，系統性地塑造內部政治議題結構與選民行為邏輯。相較之下，「安全危機」強調短期衝擊，「安全憂慮」強調心理感知，而「安全約束」則指向一種結構性條件（structural condition）。

本文提出「安全約束下的雙層政治市場模型」。該模型將台灣內部視為兩個並行運作的政治市場：其一是以公共服務供給、治理績效與地方資源分配為核心的「治理市場」，主要對應縣市長、地方議會等地方層級選舉。在此市場中，選民更關注候選人的行政能力、派系網路與地方建設實績，投票邏輯趨向「績效導向」。其二是以安全保障、主權立場與集體認同為核心的「安全—身份市場」，主要對應領導人選舉等中央層級選舉。在此市場中，選民優先考量政黨對外部威脅的應對策略、國家方向與身份定位，投票邏輯趨向「風險導向」與「認同導向」。選民並非在單一偏好維度下作出整體選擇，而是在不同

選舉情境中分別最佳化不同類型的效用函數：在地方選舉中，治理績效與資源分配占據主導；在中央選舉中，安全風險評估與國家認同則成為決定性因素。

當主要政黨在這兩個市場上形成明顯的比較優勢時，系統便可能達到穩定的分裂投票均衡。國民黨在治理市場中憑藉歷史積累的基層優勢占據上風，而民進黨在安全—身份市場中通過對「抗中保台」的強勢敘事獲得主導。此種雙層結構不僅解釋了「地方藍、中央綠」的長期穩定性，還揭示了為何既有單一解釋難以涵蓋全貌。因此，本文的主要貢獻並不在於對分裂投票現象提供最終解釋，而在於提出一個整合比較政治與國際關係視角的概念性分析框架，為未來的經驗研究提供理論假設與研究方向。

此一理論框架不僅為台灣政治提供了一個整合性的解釋框架，亦具有更廣泛的比較政治意義。它表明，在持續外部威脅與安全約束下，民主政治並不必然收斂為單一競爭維度或左右交替模式，而可能演化為多層次、功能分化的政治市場體系。外部安全環境因此不再僅是外交政策的背景變數，而是深刻內生化為選民行為、政黨策略與整體競爭結構的結構性因素。通過對台灣案例的深入分析，本文試圖展示安全約束如何塑造內部政治的長期模式，並進一步探討該模型在其他面臨高安全壓力民主體（如韓國、以色列或部分東歐國家）中的潛在適用性。這些政治體同樣面臨外部威脅與內部治理需求的張力，可能產生類似的分層競爭邏輯。

貳、文獻綜述：分裂投票、台灣選舉與安全結構的理論缺口

台灣自 2010 年代以來持續出現的「地方藍、中央綠」選舉分化現象，已成為觀察當代台灣民主政治的一個核心謎題。此一現象表現為：在縣市長、地方議會等地方層級選舉中，泛藍陣營（以國民黨為核心）往往占據明顯優勢，而

在領導人選舉等中央層級選舉中，泛綠陣營（以民進黨為核心）則連續勝出，形成高度穩定的分裂投票（split-ticket voting）模式。儘管既有研究從多角度提供了豐富解釋，但這些文獻大多各自為政，缺乏一個能夠同時整合地方治理邏輯、政治安全邏輯以及外部結構性壓力的統一理論框架，從而難以充分說明為何此種層級分化能夠在多個選舉週期中長期維持，而未演變為單一政黨主導或典型的意識形態交替競爭。

一、分裂投票理論

首先，在比較政治學領域，分裂投票研究主要源於對美國領導人與國會選舉的觀察（Fiorina, 1996, pp. 1–32）。美國學者長期關注選民為何在不同選票上支持不同政黨或候選人（Campbell et al., 1960, pp. 121–158）。經典解釋包括選民的理性計算：部分研究認為選民有意通過分裂投票實現權力制衡（divided government），防止單一政黨過度集中權力，從而降低政策極端化風險（Fiorina, 1996, pp. 1–32）；另一些研究則強調職位差異（position-specific voting），即選民對不同公職（如行政首長 vs. 立法者）有不同能力期待，因此可能支持不同陣營的候選人（Lewis-Beck et al., 2008, pp. 19–42）。此外，在多層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框架下，歐盟國家的研究發現，選民在地方、國家與超國家層級選舉中往往表達不同偏好，例如在地方選舉中更注重具體績效與服務，在國家或歐盟選舉中則更關注宏觀議題或身份認同（Lijphart, 2012, pp. 1–47）。這些理論雖有助於理解分裂投票的微觀機制，但大多隱含一個前提：政治競爭仍發生在同一議題空間內，僅因權力層級或制度設計而分化。換言之，它們較少將外部安全環境視為長期結構性變數納入分析框架，因此難以解釋在某些政治體中，議題本身發生性質分裂——地方選舉聚焦治理績

效，而中央選舉高度圍繞生存風險與國家認同 (Evans & Whitefield, 1993, pp. 521-548)。此種單一空間假設限制了既有理論對台灣案例的解釋力，尤其當外部威脅成為持續結構性約束時。

二、台灣地方政治研究

其次，台灣本土選舉研究傳統上更強調地方派系 (local factions) 與組織動員機制的的作用 (游清鑫，2004，頁 47-98)。國民黨在威權時期 (1949-1987) 通過與地方派系的結盟，建立起龐大的基層網路，包括農會、漁會、水利會、宗教團體、客運公司等 (趙永茂，2024，頁 183-190)。這些網路不僅提供選舉動員能力，還構成資源分配 (如工程標案、福利補助、信貸特權) 與政治支持的交換渠道，使得國民黨在縣市層級選舉中維持長期優勢 (黃秀端，2006，頁 181-190)。地方選舉議題往往圍繞基礎設施建設、社會福利、經濟發展與公共服務展開，較少觸及高意識形態衝突，這進一步強化了「侍從主義」 (clientelism) 與績效導向的重要性 (劉宜君、陳敦源，2007，頁 1-51) (蔡育軒、陳怡君、王業立，2007，頁 93-135)。相關研究顯示，即使在民主化後，地方派系的影響力雖有所衰退 (如動員效率下降、黑金形象受批判)，但在中南部非都會區仍具顯著作用 (游清鑫，2004，頁 47-98)。例如，2018 年「九合一」地方選舉中，國民黨大勝多得益於地方派系的基層整合與動員。然而，此類解釋主要局限於地方層級，對領導人選舉結果的說明力有限。更關鍵的是，它們難以解答為何同一社會結構 (如派系網路支持的選民群體) 在中央層級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政治選擇——支持泛綠而非泛藍。這暗示地方派系雖重要，但並非分裂投票的唯一或決定性因素。

三、身分政治與兩岸因素

與地方派系研究相對，另一類台灣政治文獻則聚焦身份政治 (identity politics) 與兩岸關係在領導人選舉中的核心地位 (吳玉山，1997，頁 259-280)。隨著民主化推進，國家認同問題逐漸成為中央選舉的關鍵軸線 (耿曙、劉嘉薇、陳陸輝，2009，頁 3-56)。民進黨在「台灣主體性」、主權立場、對中政策與「抗中保台」敘事上擁有較強的議題主導權，尤其在外圍壓力 (如中國大陸軍事演習、經濟脅迫) 上升時，更能有效動員選民的集體焦慮與認同感 (張傳賢、黃紀，2011，頁 3-71)。世代研究進一步指出，年輕群體在認同議題上更傾向泛綠，這被視為領導人選舉綠營連續勝出的重要結構性因素 (Tsai, Chia-Hung，2016, pp.1650007)。相關實證分析顯示，領導人選舉中兩岸關係與國家認同往往壓倒經濟或治理議題，成為選民投票的首要考量 (張佑宗，2009，頁 41-72)。然而，此一解釋同樣面臨明顯局限：如果身份認同是決定性變數，則難以說明為何同一選民在地方選舉中仍可能支持泛藍候選人 (或至少不強烈排斥)，亦無法解釋為何地方選舉較少出現同等程度的身份動員與極化。此種「議題分層」現象表明，身份政治雖主導中央選舉，卻並非無所不在的單一邏輯。

四、安全結構與內部政治

第四類文獻來自國際關係領域，主要探討外部威脅如何影響內部政治結構與選民行為 (Fearon, 1994, pp. 577-592)。「圍旗效應」 (rally around the flag) 理論指出，在國際危機或外部威脅出現時，公眾往往暫時團結支持現任政府或領導者，以體現國家凝聚力 (Mueller, J. E., 1970, pp 18-34)；安全困境 (security dilemma) 理論則強調外部不確定性會推動內部權力集中與保守傾向 (Jervis, R., 1978, pp. 167-214)。此外，Putnam 的「兩層博弈」 (two-level

games) 模型突出領導人在國際談判中須同時應對內部壓力與國際約束

(Putnam, 1988, pp. 427-460)。這些研究雖揭示外部環境對內部政治的短期影響，但多聚焦外交決策、危機反應或領導者支持率波動，而較少分析長期選舉行為模式與政黨競爭結構的變遷。它們往往將內部政治視為外部政策的約束條件，而非被外部安全結構深度形塑的結果。因此，這些理論難以解釋為何台灣的外部安全壓力（持續的主權爭議、地緣戰略不確定性、中國大陸軍事現代化）會系統性地導致選民在不同選舉層級採用不同投票邏輯——地方選舉「去安全化」（de-securitized），中央選舉則高度「安全化」（securitized）。

近年來，少數學者開始嘗試將內部政治與安全結構相結合，指出在高威脅環境下，政治安全議題可能主導中央政治，而地方政治則相對聚焦治理與民生。但這些嘗試多停留在描述性層面，缺乏系統的理論建模，亦未從政治市場、需求結構或選民效用最佳化的角度加以解釋。換言之，現有文獻雖分別揭示了治理績效、身份認同與外部威脅的重要性，卻未能說明這些因素為何在不同選舉層級中呈現穩定的「分工」與互補，從而形成長期的分裂投票均衡。

五、理論缺口

綜合上述文獻，既有研究存在三個主要理論缺口。其一，大多數理論隱含單一政治空間假設，未充分考慮公共需求可能在性質、風險結構與時間維度上發生根本分裂。其二，台灣選舉研究往往將地方政治（派系、績效）與中央政治（認同、安全）分別討論，缺乏能夠跨越層級的整合性框架。其三，國際關係研究雖強調外部環境的重要性，但較少深入分析其對選民行為、政黨比較優勢與整體競爭結構的長期、內生影響。因此，目前學術界尚缺乏一個能夠同時解釋地方與中央選舉差異、並揭示其結構性來源（尤其是安全約束）的理論模

型。

基於上述文獻缺口，本文提出「安全約束下的雙層政治市場模型」，旨在整合比較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的分析視角。該模型認為，在持續外部威脅與未解決主權爭議的結構性條件下，台灣政治體內部將形成兩類不可替代的公共需求：一是維持日常社會經濟運作的「治理需求」，強調績效、資源分配與地方管理；二是確保政治體生存、定位與集體認同的「安全—身份需求」，強調風險應對、國家方向與外部威脅管理。當這兩類需求在風險性質（地方性 vs. 全球性）、時間維度（短期 vs. 長期）與責任層級（地方 vs. 中央/國際）上高度分化，並由不同政黨提供相對可信的供給時，政治競爭便會自然分裂為兩個相對獨立的市場。選民在不同選舉情境中分別最佳化不同類型的效用函數：在地方選舉中優先治理績效與基層服務；在中央選舉中優先安全保障與認同立場，從而產生穩定的分裂投票模式。

叁、理論框架：安全約束下的雙層政治市場模型

本節系統闡述「安全約束下的雙層政治市場模型」，作為理解台灣地方選舉與領導人選舉長期分化現象的核心理論框架。此一模型試圖超越既有研究的碎片化解釋，將比較政治學中的分裂投票理論、政治市場學的供需邏輯以及國際關係中的安全約束機制有機整合，形成一個中層理論。它既針對台灣個案提供解釋力，又具備跨國比較的潛力，能夠與其他面臨持續外部威脅的民主體展開對話。

一、單一政治市場的局限

傳統民主理論與政黨競爭模型通常假定存在一個統一的競爭空間（Evans & Whitefield, 1993, pp. 521-548）。無論是經典的左右光譜、經濟—文化雙軸，還

是當代的身份政治模型，政黨都被視為圍繞同一組議題集合競爭選民支持，選民則依據相對穩定的整體偏好在不同選舉中作出選擇（Dalton, 2013, pp. 27-54）。此種單一政治市場假設在多數西方民主體中大致成立：選民傾向於在地方與中央層級維持一致的政黨支持，政黨體系亦趨向收斂為左右交替或多黨制均衡。然而，在某些長期處於外部安全壓力的政治體中，此一假設明顯失效。台灣自 2010 年代以來的選舉經驗即為一典型例證：縣市長及地方議會選舉中泛藍陣營系統性占據優勢，而領導人選舉中泛綠陣營連續勝出。此種分化並非隨機波動、資訊不對稱或短期候選人魅力所能解釋，而是跨越多個選舉週期的結構性模式。既有解釋路徑——地方派系動員能力、身份認同主導、世代結構變遷等——雖各自提供了重要洞見，卻難以同時解答為何同一選民群體會在不同層級理性支持不同陣營，以及此種分裂為何能夠長期穩定而未收斂為單一政黨優勢或典型意識形態競爭。

雙層政治市場模型的核心洞見在於，當政治議題的性質在風險結構、時間維度與責任層級上出現高度異質性時，內部政治競爭將自然分化為多個相對獨立的領域。外部安全約束不再僅僅是外交政策的背景條件，而是內生性地重塑公共需求結構、政黨比較優勢與選民行為邏輯，從而形成穩定的雙層政治均衡。

二、公共需求的雙重結構

政治市場學將民主過程理解為一種交換關係（林繼文，2005，頁 67-104）：政黨扮演政策供給者的角色，選民則是需求表達者，選舉機制則充當市場選擇與匹配的工具。傳統模型默認供給與需求在單一市場中實現均衡，選民的偏好向量相對固定，政黨沿著同一維度定位，競爭往往趨向中位選民定理或

多維空間均衡 (Riker, 1982, pp. 1–40) (Cox, 1997, pp. 69–111)。然而，當公共需求本身發生根本性分裂——即存在兩類不可替代、不可通約的需求類型——單一市場便無法有效容納全部政治交換。需求的分裂迫使競爭自然分層，形成兩個並行運作的市場，政黨在各自市場中發展出專屬的比較優勢，選民則在不同選舉情境中切換最佳化目標。

雙層模型最關鍵的區分在於兩種根本不同且不可相互替代的公共需求。第一類是治理需求，這是現代社會日常運行與社會再生產的基礎，涵蓋公共服務供給、基礎設施建設、社會福利與資源分配、行政效率、地方經濟發展以及生活品質提升等多個面向。治理需求的顯著特徵在於可觀察性強、責任歸屬明確、政策效果顯現週期較短、主要發生在次中央層級且外部干擾相對有限，同時高度依賴專業行政能力與基層資源動員網路。因此，在治理需求主導的選舉中，投票邏輯趨向績效導向，選民優先支持被視為「管理更好」、執行力更強的政黨或候選人，意識形態分歧往往退居次要位置。

第二類是安全—身份需求，此類需求攸關政治體的生存、定位與集體命運，涵蓋外部威脅應對、國防能力、主權維護、國際地位、集體認同構建以及長期戰略方向等議題。與治理需求形成鮮明對比，安全—身份需求具有高度不確定性、效果長期滯後、強烈的情緒與象徵性、與外部行為體深度互動以及失敗後果不可分割等特徵。一旦安全保障失守，可能導致災難性甚至生存層面的後果。因此，在此類需求主導的選舉中，投票邏輯轉向風險規避型，選民傾向支持被視為「更能保護我們」、在認同敘事與安全承諾上更具可信度的政黨。

三、政治市場的分層機制

兩種需求的不可替代性構成了模型的微觀基礎。治理績效無論多麼優異，

都無法替代安全保障的缺失；反之，強硬的安全立場與認同動員亦無法長期彌補持續的治理失敗。兩者並非同一連續體上的權衡，而是並列且不可通約的公共產品。選民無法用一類需求的滿足來補償另一類缺失，此種不可通約性為政治競爭的分層提供了堅實的個體理性依據。

當主要政黨在兩類需求上形成明顯差異化的比較優勢與可信承諾時，政治競爭便分裂為兩個相對獨立的市場。治理市場以公共管理質量、行政績效與資源分配效率為核心競爭維度，主要發生在地方選舉層面，選民關注具體、可驗證的政策結果，政黨優勢往往依賴歷史積累的基層網路、派系動員與服務交換能力。安全—身份市場則以安全承諾、認同立場與戰略方向為核心，主要發生在中央選舉層面，選民關注風險管理能力與象徵性敘事，政黨優勢則依賴議題主導權、危機動員以及對外部威脅的解讀能力。政黨由此走向專業化定位：一黨可能在治理市場占據主導地位，另一黨則在安全—身份市場更具可信度，形成穩定的市場分割格局。

四、選民效用函數

選民行為在此一框架下被理解為分層效用最大化過程（盛治仁，2003，頁21-51），而非單一偏好下的整體選擇。選民在不同選舉情境中最佳化不同的效用函數，其基本形式可表述為：

$$U = \alpha S + \beta G$$

其中 S 代表安全—身份效用， G 代表治理效用， α 與 β 為權重，且通常歸一化處理（ $\alpha + \beta = 1$ ）。選舉層級的不同會系統性地改變權重結構：在地方選舉中， β 遠大於 α ，治理效用占據主導；在中央選舉中， α 遠大於 β ，安全—身份效用成為決定性因素。因此，同一選民群體可以在地方層面理性支持治理優勢

明顯的政黨，同時在中央層面支持安全—身份優勢明顯的政黨。此種分層效用最大化正是分裂投票的微觀機制，而非認知失調、資訊不足或情緒波動。

雙層市場的形成並非普遍現象，而是特定條件下的內生產物，其最關鍵的結構性條件是持續且顯著的外部威脅。設外部威脅水平為 T ，則安全權重 α 可表達為：

$$\alpha = f(T)$$

其中 $f(\cdot)$ 為單調遞增函數：威脅強度上升導致安全權重增大，安全—身份市場在整體政治競爭中的重要性隨之提升；威脅水平下降則使治理權重回升。也即，當 $\alpha(T) > \beta$ 時，中央選舉由安全邏輯主導；當 $\beta > \alpha(T)$ 時，地方選舉由治理邏輯主導，從而形成穩定的分層均衡。外部安全環境因此成為內部政治結構的深層決定因素，它不僅在危機時刻引發圍旗效應，更通過長期不確定性持續重塑需求結構、政黨定位與選民認知框架 (Fearon, 1994, pp. 577-592) 。

五、模型的適用條件

政治市場分化還需要相應的制度條件作為支撐。首先，不同層級政府必須承擔差異化的功能職責；其次，選舉需獨立舉行而無強制捆綁；第三，制度設計允許選民進行分裂投票；第四，權力結構不可完全垂直整合。半總統制、強地方自治以及多層級選舉日程的分離特別有利於雙層結構的鞏固。台灣的憲政安排——領導人直選結合高度地方自治、選舉週期錯開——正是此類制度條件的典型體現。

當兩類需求均強烈存在且不可替代、政黨在兩市場形成穩定比較優勢、制度允許層級分離與分裂投票、外部威脅長期持續時，政治系統將收斂到一個穩定的雙層政治均衡。其典型表現包括地方與中央選舉結果的系統性分化、分裂

投票行為的長期穩定性、政黨的專業化定位，以及第三黨發展空間的結構性受限——因為第三勢力難以同時在兩個需求性質迥異的市場中建立足夠可信的供給能力（吳玉山，2021，頁 163-168）。

雙層模型對民主政治研究提出了若干根本性挑戰。它質疑單一政治空間假設，指出政治競爭可以是多維且功能分層的；它挑戰投票一致性假設，表明選民在不同層級理性支持不同陣營是正常而非異常行為；它亦突破內部政治自主性假設，將外部安全結構視為深度內生化內部競爭與政黨體系的結構性變數，從而將安全約束從外交政策背景提升為塑造選民行為與政黨專業化的核心機制。

作為中層理論，雙層模型不依賴單一國家經驗，具有較強的可比較性。它能夠與國際關係中的外部威脅理論、多層治理研究以及分裂投票文獻展開對話，並產生一系列可檢驗的假設。例如，外部威脅強度與中央選舉中安全權重的正相關關係、治理市場優勢政黨在地方選舉中的更高穩定性、外部威脅下降時期分裂投票強度的減弱等。這些假設為後續實證檢驗提供了清晰的方向。下一節將把該模型應用於台灣的具體選舉數據與歷史過程，檢驗其解釋力並揭示機制運作的細節。

肆、台灣案例分析：雙層政治市場的現實運作機制

在前文提出的「安全約束下的雙層政治市場模型」基礎上，本節將以台灣的具體政治實踐為經驗案例，深入剖析該理論如何在現實選舉行為、政黨競爭與選民決策中得到體現。台灣政治同時具備高度競爭性的民主制度與持續的主權爭議及外部安全壓力，此一獨特組合為檢驗雙層模型提供了近乎理想的場域。透過考察地方選舉與領導人選舉之間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分化，吾人可以看

到，此種「地方藍、中央綠」的模式並非短期偶然現象或選民非理性行為，而是由制度安排、社會結構、歷史路徑依賴以及外部安全環境共同塑造的結果。雙層政治市場模型在此並非抽象假設，而是對台灣選舉現實的一種解釋性框架，它揭示了選民如何在不同層級理性地最佳化不同類型的公共需求，從而形成穩定的政治均衡。需明確的是，本節關注的是双层政治市场如何形成，而非其长期稳定性问题；后者将于下一節专门讨论。

台灣的政治體制屬於半總統制，領導人直接民選並掌握外交、國防與安全的核心權力，而縣市政府則在教育、醫療、交通、社會福利、城市規劃、經濟發展與地方治安等民生領域享有高度自治權。此種權力與責任的明確分層構成了雙層市場形成的最重要制度基礎（吳玉山，2021，頁 163–168）。中央政府主要承擔對外關係、兩岸政策、國防戰略與國際定位等高風險、長期性議題，而地方政府則負責直接影響居民日常生活品質的具體治理事務（劉宜君、陳敦源，2007，頁 1-51）。責任分離使得選民不必在單一選舉中一次性決定所有政策方向，而是可以通過不同層級的投票分別表達對治理績效與安全保障的偏好。此種制度設計天然允許並鼓勵分裂投票的存在：選民可以在地方選舉中支持被認為行政能力更強的候選人，同時在領導人選舉中支持在安全與認同議題上更具可信度的政黨，而無需擔心此種選擇會產生內在矛盾。

選舉週期的錯開進一步強化了議題分離的效應。台灣的地方選舉通常每四年舉行一次（如 2014、2018、2022 年的「九合一」選舉），而領導人選舉每四年一次但與地方選舉錯開（如 2016、2020、2024 年），此種時間安排使兩類選舉在社會注意力與媒體焦點上相對獨立。地方選舉的競選話語往往圍繞具體建設項目、福利政策、經濟發展指標與行政表現展開，語言偏向務實、技術性與

績效導向；領導人選舉則高度政治化，競選焦點迅速集中於兩岸關係、國家認同、國際支持與安全風險評估。此種議題與話語的結構性分離，不僅在客觀上塑造了選民的認知框架，亦在主觀上引導其將不同層級的投票視為針對不同公共產品的選擇過程。

在地方層級，治理需求占據主導地位，成為選民投票決策的核心驅動力。縣市長作為地方行政首長，其施政績效直接、可觀察地影響居民的日常生活：從道路橋梁的修建、公共交通的改善、醫療資源的配置，到社會福利的發放、治安維護、環保治理與地方產業振興，無一不與選民的切身利益緊密相關。在此種情境下，選民傾向於依據候選人的行政能力、資源獲取渠道與執行效率作出判斷，而較少將國家認同或意識形態立場作為首要考量。長期以來，國民黨在地方政治中維持顯著優勢，此一優勢主要源於威權時期遺留下來的龐大基層網路。農會、漁會、水利會、社區發展協會、宗教團體以及各種地方派系，在民主化後雖經歷轉型，卻依然構成有效的選票動員與資源整合機制。這些網路不僅能夠高效組織選民參與投票，還通過工程標案、福利補助、信貸優惠、就業機會等利益交換渠道，維繫長期的政治支持關係。此種客戶主義

(clientelism) 特徵使地方政治呈現出明顯的「服務交換」邏輯：候選人是否能夠為選區爭取中央預算、推動重大建設、解決具體民生問題，往往比其對兩岸關係的立場更具決定性 (游清鑫，2004，頁 47-98)。

地方治理事務的高度技術性進一步鞏固了績效導向的競爭格局。許多在地方選舉中勝出的候選人擁有行政官僚、醫師、工程師、企業家或專業經理人的背景，其通過過往的施政記錄或專業形象建立治理能力的可信承諾。即使部分選民在國家認同議題上傾向泛綠陣營，其亦可能在地方層面理性支持泛藍候選

人，只要後者被認為更能帶來具體的改善。此種跨陣營支持在台灣中南部非都會區尤為常見，反映出治理市場相對低意識形態化、以結果為中心的本質。

與地方選舉形成鮮明對比，領導人選舉幾乎完全被安全—身份需求所主導。由於領導人直接掌控對外政策、國防預算、兩岸談判與國際戰略，其選擇被絕大多數選民視為攸關政治體生存與集體命運的根本決定（張傳賢、黃紀，2011，頁 3-71）。兩岸關係在此過程中構成最核心的競爭軸線：不同政黨對中國大陸的政策取向、風險評估與應對策略，成為選民判斷候選人能否有效保障安全的首要依據。安全議題的本質特徵——高度不確定性、長期滯後性、失敗後果的災難性以及情緒與象徵性的強烈——使得選民無法通過短期經驗直接驗證哪一種政策更「安全」。其只能依賴對候選人立場、歷史記錄、國際支持網路以及危機應對形象的主觀判斷。在外部威脅感上升的時期（如軍事演習、經濟脅迫或地緣緊張加劇），風險規避心理會顯著放大，選民更傾向支持被認為立場堅定、「不會輕易妥協」或「能夠獲得美日等盟友實質支持」的候選人（吳玉山，1997，頁 269-279）。

身份認同亦在領導人選舉中發揮關鍵動員作用。國家象徵、歷史敘事、台灣主體性、文化價值與「抗中保台」的集體情緒，往往被納入競選話語，使選舉帶有強烈的象徵性與情感色彩（耿曙、劉嘉薇、陳陸輝，2009，頁 3-56）。民進黨在此一市場中長期占據比較優勢，其政治敘事成功地將主體意識、安全保障與國際空間連結起來，並通過強化與美國、日本等國家的實質關係來提升可信度。即使在經濟表現或地方治理存在明顯爭議的時期，只要安全議題成為選舉主軸，選民仍可能優先考慮風險控制而非績效評估。這正是為何在某些地方選舉週期中泛藍陣營取得壓倒性勝利後，隨後的領導人選舉卻由泛綠陣營連

續獲勝的關鍵原因。

分裂投票在台灣並非均勻分布，而是呈現出明顯的區域、社會與世代差異。都會區、年輕世代、高教育程度群體通常更關注身份認同與安全議題，在領導人選舉中支持泛綠陣營的比例顯著高於平均水平；相反，農村與中小型縣市、中老年群體、依賴地方資源網路的選民，則更重視治理績效、經濟穩定與基層服務，在地方選舉中更傾向支持泛藍陣營。然而，這些社會分布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存在相當程度的流動性。同一選民可能在不同選舉週期因議題特徵的變化而調整立場。更重要的是，分裂投票並不意味著選民認知分裂或缺乏一致性，而是反映出其對不同層級政治責任的清晰區分：許多人認為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務是改善生活、提供服務，而中央政府的首要任務是守護安全與戰略方向。因此，在不同選舉中支持不同陣營被視為合理而務實的理性選擇。此種觀念經過二十餘年的選舉實踐，已逐漸內化成為台灣選舉文化的一部分。

政黨本身亦在長期競爭中主動適應雙層市場結構，並透過策略調整進一步強化市場分離。國民黨在地方層級持續強調治理能力、建設成果與基層服務，避免過度突出敏感的兩岸立場或統派論述，以維持其在治理市場的既有優勢；民進黨則在領導人選舉中全力強化安全敘事與認同動員，同時在地方選舉中投入資源培養行政人才、改善形象，試圖逐步縮小在治理市場的劣勢。此種策略分工使兩黨競爭呈現出功能分化而非全面對抗的特徵。隨著時間推移，選民逐漸形成對各政黨「擅長領域」的穩定認知：國民黨被視為「會做事的地方政府」、民進黨被視為「能保護台灣的中央領導」。政黨形象的固化提高了跨市場競爭的成本——在安全議題上建立新信譽需要長期的國際支持與危機表現，而在地方治理中重建網路則需要時間、資源與派系整合。因此，主要政黨傾向

於強化既有比較優勢，而非冒險全面挑戰對方市場。

制度分層（中央/地方），選舉錯開，議題分離，社會結構差異以及政黨選擇的路徑依賴下，台灣政治體系形成了相對穩定的雙層政治均衡：地方選舉主要反映治理市場的競爭結果，領導人選舉則主要反映安全—身份市場的競爭結果。選民通過在兩個層級分別配置權力，實現對日常治理需求與安全需求的雙重滿足，同時在不確定環境下維持政策多樣性與制度彈性。此種分散配置本身具有風險對沖的功能：無論哪一類需求暫時占據上風，另一類需求都不會完全被忽視，從而避免單一政治力量在所有領域形成壓倒性支配。

此一均衡並非完全靜態，而是會隨外部環境、經濟表現與社會變遷發生動態調整。例如，當中國大陸軍事壓力顯著上升或國際地緣局勢緊張時，中央選舉中的安全—身份權重可能進一步提升，導致泛綠陣營的優勢擴大；反之，當經濟下行、民生議題突出或地方建設需求強烈時，治理市場的相對重要性可能回升，泛藍陣營在地方層面的支持度隨之鞏固。然而，只要兩類公共需求同時強烈存在、制度繼續允許層級分離與分裂投票、外部威脅保持結構性持續性，雙層結構就難以完全收斂或消失。

台灣案例表明，分裂投票並非異常、偶然或非理性行為，而是對複雜政治現實的一種理性適應。制度上的權力與責任分層、社會結構的區域與世代差異，以及長期存在的外部安全約束，共同促成了治理市場與安全—身份市場的並行運作。政黨在不同市場中形成的比較優勢與策略適應，又進一步鞏固了此一分化格局，使地方與中央選舉結果呈現出跨越多個週期的長期穩定性。通過對台灣經驗的細緻剖析，不僅驗證了雙層政治市場模型在現實中的解釋力，亦為下一節探討該結構的長期穩定機制、潛在風險以及在其他高安全壓力民主體

的比較意義提供了堅實基礎。

伍、穩定機制分析：雙層政治均衡為何能夠長期維持

在前一節通過台灣具體政治實踐的剖析，已經看到地方選舉與領導人選舉之間長期存在的系統性分化並非短期現象或選民的隨意選擇，而是治理市場與安全—身份市場並行運作的必然結果。然而，一個更深層的問題隨之浮現：此種雙層結構為何能夠跨越多個選舉週期保持相對穩定，而沒有逐漸收斂為單一陣營的全面優勢，亦沒有重新整合成統一的競爭空間？本節將從選民行為、制度設計、政黨策略、資訊傳播、社會結構以及外部環境等多個維度，系統探討此一雙層政治均衡得以長期維持的內在機制。換言之，若說前一節解釋的是雙層結構的生成邏輯，則本節進一步回答：為何此一結構能夠跨越多個選舉週期而持續存在？即其不會消失的問題。

首先是風險對沖機制（risk hedging）。分裂投票本質上可以被視為一種風險對沖策略（Fiorina, 1996, pp. 1–32）。在任何政治體中，選民都面臨不同類型的不確定性，而在安全壓力持續存在的環境中，此種不確定性被進一步放大。如果將所有政治權力集中交給同一個政黨，選民就要承擔該政黨在所有領域同時失誤的系統性風險。尤其當中央政府負責的外交、國防與兩岸政策一旦出現重大偏差，可能帶來不可逆轉的災難性後果時，選民的謹慎心理會顯著增強。與此同時，地方治理的失敗雖然亦會直接損害生活品質，但通常可以透過下一次選舉更換行政首長來逐步修正，容忍度相對較高。因此，許多選民選擇在領導人選舉中支持被認為更能保障安全與方向的陣營，而在地方選舉中支持被認為行政能力更強、能帶來具體改善的候選人。此種跨層級的權力配置並非對任何政黨徹底不信任，而是基於對不同政策領域風險性質的理性判斷：在確保集

體生存與基本安全的前提下，通過地方層面最佳化日常治理績效，從而實現整體福利的最大化。此種風險對沖邏輯一旦在選民中普遍化，就會形成穩定的行為模式，難以被單一選舉結果輕易打破。

制度安排本身亦在持續強化此種對沖機制。台灣半總統制的核心特徵在於權力與責任的明確分層：領導人直接掌握外交、國防、兩岸關係與政治安全等高風險議題，而縣市長則主要負責教育、醫療、交通、福利、治安、城市建設與地方經濟發展等直接影響居民日常生活的領域。此種分工大大降低了政策歸責的模糊性（吳玉山，2021，頁 163–168）。選民很容易將地方政府的表現歸因於縣市長的行政能力與資源調度，而將政治安全與國際定位的成敗歸因於領導人與中央執政黨的戰略抉擇。此種清晰的責任劃分，使得不同層級的選舉天然圍繞不同議題展開，避免了所有問題被單一競爭軸線所統合。此外，選舉週期的錯開進一步鞏固了議題分離。地方選舉每四年一次，領導人選舉雖然亦是四年一屆，卻與地方選舉錯開舉行。此種時間上的區隔讓兩類選舉在社會注意力、媒體焦點與競選節奏上保持相對獨立。地方選舉期間，公眾討論多集中於具體建設項目、預算分配與民生服務績效；領導人選舉期間，則迅速轉向兩岸關係、國家認同與安全風險評估。此種結構性分離不僅在客觀層面塑造了政治議程，亦在主觀層面引導選民將不同投票視為針對不同公共產品的獨立決策過程。更重要的是，地方自治賦予縣市政府相當程度的財政與政策獨立性。即使中央與地方由不同政黨掌控，日常治理亦不會立即陷入癱瘓。此種制度彈性顯著降低了分裂投票的潛在成本，使選民敢於進行跨陣營選擇。如果中央權力過度集中或地方自治空間狹小，分裂投票很可能引發嚴重的治理衝突，從而削弱其可持續性。正是因為制度設計本身具有自我維持的功能，雙層結構才得以在

實踐中不斷再生產。

其次是政黨專業化鎖定機制 (party specialization lock-in)。政黨的長期戰略適應同樣構成了均衡穩定的重要支柱。當選舉結果一再顯示某一政黨在特定市場中占據比較優勢時，該政黨往往會主動強化此一優勢領域，而逐步減少在劣勢領域的資源投入。此種路徑依賴逐漸導致政黨功能的分化。例如，國民黨長期在地方層面維持優勢，主要得益於威權時期積累的龐大基層網路以及在工程建設、福利分配與地方資源整合方面的豐富經驗。因此，它傾向於持續投資農會、漁會、水利會、社區組織與地方派系，通過具體的施政績效與利益交換機制鞏固支持基礎，同時在領導人選舉中避免過度突出敏感的兩岸立場，以免損害地方形象。相反，民進黨在安全一身份市場中更具動員力，其政治敘事成功地將台灣主體意識、政治安全與國際民主陣營的支持緊密連結起來。因此，它在領導人選舉中全力強化「抗中保台」的集體情緒與風險管理形象，同時在地方層面逐步培養行政人才、改善治理形象，試圖縮小劣勢，但總體仍以中央市場為其核心戰場 (盛杏媛，2010，頁 1-33)。隨著時間推移，選民對各政黨的「擅長領域」形成越來越穩定的預期：國民黨被視為「會做事的地方政府」，民進黨被視為「能保護台灣的中央領導」。此種政黨品牌的固化大大提高了跨市場競爭的門檻。在治理市場重建基層網路需要長期的資源投入與派系整合，在安全市場建立新信譽則需要持續的國際支持與危機表現的驗證。政黨因此更傾向於深耕既有優勢，而非冒險全面挑戰對方的核心領域。此種策略適應不僅沒有削弱雙層結構，反而通過功能分化進一步強化了市場的分離狀態。

再次是認知內化機制 (cognitive internalization)。資訊傳播與政治認知的持久性亦在維持雙層均衡中發揮關鍵作用。媒體、政論節目與公共討論往往根

據選舉類型自動調整議題框架。在地方選舉期間，報導焦點多落在建設進度、預算執行、社會福利覆蓋率、治安數據與地方經濟發展指標上，語言風格偏向務實、技術性與績效導向；領導人選舉期間，則迅速轉向軍事威脅、經濟脅迫、國際支持力度、兩岸談判前景與國家認同等高度政治化與情緒化的議題。此種議題框架的反覆強化，使選民逐漸內化了一種認知模式：地方選舉解決的是「怎麼過好日子」的問題，領導人選舉解決的是「台灣能不能繼續存在」的問題。一旦此種對應關係在社會中成為常識，分裂投票就不再被視為矛盾或不一致，而是被理解為針對不同公共需求的合理分工。此外，安全議題本身具有強烈的情緒化與象徵性特徵。每當出現軍事演習、飛彈試射、經濟制裁或地緣緊張加劇等事件，中央政治議程就會迅速被安全風險所主導。即使在日常時期治理與經濟議題更為突出，一旦外部危機浮現，公眾注意力就會瞬間轉移，從而維持安全一身份市場的持續顯著性。此種議題升溫的週期性波動，進一步鞏固了中央選舉的特殊性質。

社會結構的內在差異強化了此種認知內化。台灣不同群體對治理需求與安全一身份需求的重視程度存在明顯分化。居住在農村與中小型縣市的選民、中老年群體以及依賴農會、水利會、宗教團體等地方網路的民眾，往往更關注地方政府的實際作為，包括基礎設施改善、農業補貼、醫療資源分配與就業機會等具體利益。這些群體在地方選舉中傾向支持被認為更能爭取資源與推動建設的候選人。而在都會區、年輕世代與較高教育程度的群體中，國家認同、主體意識、國際空間與安全保障往往占據更優先的位置，其在領導人選舉中更傾向支持強調「守護台灣」的陣營。此種社會分布並非絕對對立，而是呈現出區域、世代與職業的梯度差異。更重要的是，許多選民同時身兼多種身份角色：

其既是某個縣市的居民，需要良好的公共服務與生活品質；同時亦是台灣整體的成員，關心集體命運與外部生存環境。因此，同一位選民可能在地方層面理性支持泛藍候選人以最佳化治理績效，在中央層面支持泛綠候選人以強化安全保障。此種多重身份的並存，使得兩類需求都能獲得持續而穩定的社會支持基礎。只要社會結構未發生根本性斷裂，雙層市場的需求側就難以被單一需求所完全取代。

最深層的穩定機制仍然來自外部安全環境的持續作用。只要中國大陸對台灣的主權主張與軍事壓力保持結構性存在，安全—身份需求就不可能被徹底邊緣化。外部威脅雖然強度會有波動，但其潛在性從未消失。此種「背景常量」不斷提醒社會安全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同時又通常不會直接干預或決定地方治理的日常表現。因此，地方選舉可以繼續以民生議題為主軸，而領導人選舉則始終承載著風險評估與集體命運的根本抉擇。外部壓力的長期性為雙層結構提供了外部錨定，使其難以通過內部政治競爭自行收斂。

綜合上述多個機制，雙層政治市場一旦形成，便呈現出明顯的自我強化特徵。選民將分裂投票內化為風險對沖的合理策略，政黨據此調整資源配置與品牌定位，制度設計降低跨陣營選擇的成本，資訊框架與社會結構提供持續的認知與需求支撐，而外部安全環境則作為深層約束維持安全議題的結構性權重。這些因素相互交織、循環強化，使得雙層均衡具有高度的韌性與穩定性。當然，此一均衡並非永恆不變。如果外部威脅強度出現根本性下降、憲政制度發生重大變革、社會世代更替帶來認同結構的重塑，或者經濟危機導致民生議題全面壓倒安全議題，兩類需求的相對權重才可能發生顯著再分配，從而改變政治市場的基本格局。然而，在當前條件持續存在的情況下，分裂投票與雙層分

化將繼續作為台灣政治生活的穩定特徵而存在。

總之，台灣雙層政治均衡的長期維持並非偶然或外生變數作用的結果，而是選民理性策略、制度自我維持、政黨路徑依賴、資訊認知固化、社會需求分布以及外部安全壓力的多重機制共同塑造的產物。這些機制相互支撐、彼此強化，使得治理市場與安全—身份市場能夠在長達二十餘年的民主實踐中並行運作，而未出現明顯的收斂或整合趨勢。此一分析不僅深化了對台灣選舉現實的理解，亦為後續探討該模型在其他面臨類似安全約束的民主政治體中的適用性與潛在變異提供了理論基礎。

陸、比較視角與理論外推：雙層政治市場的適用條件

前文通過對台灣政治實踐的細緻剖析，論證了「安全約束下的雙層政治市場模型」對解釋地方選舉與中央選舉長期分化現象的強大解釋力。然而，此一模型的理論價值不應局限於單一案例。若其具備普遍意義，則應當能夠在相似結構性條件下外推至其他政治體。本節將從比較政治與國際關係的交叉視角出發，探討雙層政治市場形成的必要條件，並通過若干具有類似特徵的案例進行比較分析，以揭示該模型的適用範圍及其邊界。

雙層政治市場的出現並非所有民主體制的必然結果，而是需要若干關鍵條件同時滿足（Lijphart, 2012, pp. 1-47）。首先，最為核心的條件是存在持續且顯著的外部安全壓力。只有當國家或政治體面臨長期的主權爭議、軍事威脅或生存風險時，安全議題才會長期占據政治議程的核心位置，並難以被經濟、社會或文化議題完全取代（Fearon, 1994, pp. 577-592）。短暫的危機或偶發衝突不足以塑造穩定的雙層結構，只有結構性、持久的不確定性才能深刻改變選民的投票邏輯與政黨競爭模式。其次，政治體必須具備真實的民主競爭機制。選

民能夠通過定期、自由的選舉表達偏好，並在不同層級獨立分配權力。如果權力高度集中於單一領袖或缺乏實質競爭，分裂投票便無從談起（Dalton, 2013, pp. 27–54）。第三，制度設計上需要明確的權力與責任分層。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必須承擔性質迥異的職責：前者主導高風險的外交、國防與國家定位，後者負責直接攸關民生福祉的具體治理事務。只有當此種分層足夠清晰，選民才能依據議題屬性在不同選舉中作出區分性選擇。若地方政府自治權微弱，或中央權力覆蓋幾乎所有領域，兩類公共需求將被迫擠壓在同一選舉框架內，雙層市場便難以獨立形成。最後，主要政黨需要在不同政策領域展現出明顯的功能性差異化優勢。如果單一政黨在治理績效與安全保障兩方面均占據壓倒性地位，選民缺乏跨陣營投票的動機。只有當政黨能力呈現出路徑依賴式的分野，雙層結構才可能獲得長期穩定性（Cox, 1997, pp. 69–111）。

在滿足上述條件的民主政治體中，雙層政治市場的類似特徵確實反覆出現。以色列是一個典型例證。該國長期處於高度敵對的區域環境中，安全與生存議題始終是中央政治的首要軸線。總理選舉與國會選舉往往圍繞軍事戰略、對巴勒斯坦的政策、伊朗核威脅以及與美國關係的深度展開，選民在中央層面傾向支持被認為立場堅定、危機應對能力強的政黨或領袖。然而，在市政選舉與地方議會層面，議題焦點迅速轉向住房短缺、交通擁堵、公共服務質量、教育資源分配與城市發展規劃等具體民生問題，意識形態衝突相對淡化。許多以色列選民在政治安全上支持右翼強硬派，但在地方層面選擇更注重行政效率或福利政策的中間或左翼力量。此種跨層級的投票模式反映出選民對生存風險與日常生活需求的雙重理性考量，與台灣的「地方藍、中央綠」存在結構性相似性。

韓國在冷戰後期與民主化初期亦呈現出類似的分化邏輯。面對朝鮮持續的軍事威脅與核武開發，政治安全長期主導中央政治話語。領導人選舉往往成為對朝鮮政策、韓美同盟強度以及半島統一路徑的公投，選民傾向支持在風險管理上更具可信度的候選人。與此同時，地方選舉則更多圍繞區域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城市更新與社會福利展開。儘管韓國的地方自治程度與政黨體系與台灣有所不同，但外部安全壓力對政治議題分層的塑造作用具有高度可比性。選民在中央層面優先風險規避，在地方層面追求治理績效的傾向同樣清晰可見。

波羅的海三國在蘇聯解體後的轉型期亦一度表現出安全與治理需求並存的特徵。面對俄羅斯的潛在地緣威脅，國家認同、安全保障與北約、歐盟整合成為中央政治的核心議題，而地方政府則必須應對經濟結構轉型、基礎設施落後、人口外流與社會服務重建等緊迫問題。不同層級的選舉因此呈現出不同的競爭邏輯：中央選舉高度政治化，地方選舉則更務實、技術導向。烏克蘭在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與頓巴斯衝突爆發前後，安全議題急劇上升，但地方治理需求並未消失，選民在不同層級對不同公共產品的偏好差異同樣明顯。這些案例共同表明，在外部威脅長期存在且民主機制相對成熟的環境下，政治競爭往往自然分化為功能性領域，而非完全圍繞單一意識形態或經濟左右軸線展開。

與上述高安全壓力民主體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安全環境相對穩定的西歐與北美國家。在這些政治體中，國家通常不面臨直接的生存威脅或主權爭議，政治安全議題很少成為選舉的核心分歧軸線。即使地方與中央選舉的關注點存在差異，例如中央更注重宏觀經濟與外交、地方更注重教育與治安，但兩類議題大體仍位於同一政治光譜之內，受左—右經濟政策、文化價值或族群議題的統合

影響。分裂投票固然可能因短期因素出現，但通常缺乏跨週期的結構性穩定性，亦不形成政黨在治理與安全領域的明顯功能分工。這表明外部安全環境的性質是決定政治市場是否發生分層的關鍵變數。當安全問題不再具有生存性意義時，治理需求與安全需求可以在同一政策框架中被整合，雙層結構便難以長期維持。

雙層政治市場還對政黨體系的演化產生深遠影響。在單一競爭空間中，中間政黨或第三勢力往往可以通過調和不同議題、提出折中方案來吸引廣泛選民。然而，在雙層結構中，政黨需要在兩個相對獨立的市場中同時建立可信承諾，此一要求極為嚴苛。如果某一政黨在治理績效上表現平庸、在安全立場上模糊不清，就可能在兩個市場同時處於劣勢，難以形成穩固的支持基礎。

進一步言之，雙層政治市場結構對第三勢力的發展形成結構性約束。第三政黨若欲突破，需同時在治理市場與安全一身份市場建立可信承諾。然而，兩類市場的需求性質差異極大：前者依賴長期基層網路與行政績效，後者則依賴國際連結、安全敘事與認同動員。此種「雙重進入門檻」顯著提高了新興政黨的競爭成本，使其難以在兩個市場中同時取得突破，從而導致其多半僅能在單一市場中短暫崛起，卻難以轉化為全局性政治力量。因此，此種市場結構傾向於強化既有主要政黨的比較優勢，而非促進多黨制的進一步分化。此一特徵在台灣表現得尤為突出，但在以色列、韓國等高安全壓力民主體中，亦可觀察到主要政黨在各自優勢領域深耕、第三勢力難以突破的類似趨勢。

儘管雙層政治市場模型展現出較強的比較潛力，其適用範圍仍存在明確邊界。首先，如果外部威脅突然大幅下降或徹底消失，安全一身份需求可能迅速退居次要位置，兩個市場隨之重新整合為單一競爭空間。其次，若發生重大的

制度改革，例如削弱地方自治、統一選舉週期或改變權力分配結構，分層表達的渠道將被壓縮，雙層特徵隨之弱化。再次，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遷，如快速的經濟轉型、大規模人口流動、世代更替導致的認同重塑，亦可能改變兩類需求的相對權重與分布格局。因此，該模型更適合用於分析那些外部安全約束長期穩定、民主制度相對成熟的政治體，而非短期政治波動或低威脅環境下的常規民主競爭。

總之，通過與高安全壓力民主政體以及低威脅穩定民主政體的比較分析，可以更清晰地認識到，雙層政治市場並非台灣獨有的特殊現象，而是在持續外部威脅、民主競爭機制、權力分層以及政黨功能差異化等條件共同作用下可能反覆出現的一種政治結構形式。外部安全環境作為深層變數，深刻塑造了內部政治競爭的議題框架與選民行為模式。此一發現不僅拓展了模型的理論外延，亦為理解當代地緣政治壓力如何影響民主政治的內部運作提供了新的分析視角。

柒、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儘管本文提出「安全約束下的雙層政治市場模型」，並嘗試以此解釋台灣長期存在的「地方藍、中央綠」分裂投票現象，但本文仍屬於以理論建構為主的探索性研究，在經驗驗證、微觀機制與比較檢驗等方面仍存在若干限制，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補充與深化。

首先，本文的分析主要建立在宏觀結構與制度條件之上，對選民個體層級的心理機制與認知過程缺乏系統性的實證檢驗。本文假設，在持續的外部安全壓力下，政治體內部的公共需求會分化為治理需求與安全—身份需求兩類，並進一步導致選民在不同選舉層級中分別最佳化不同類型的效用函數，從而形成

分裂投票行為。然而，政治行為研究長期指出，選民投票並不總是遵循嚴格的理性計算邏輯。部分學者的研究表明，在許多成熟民主國家中，政治立場與身份認同（position voting）往往比政策績效或行政能力更具解釋力（Clarke, Sanders, Stewart, & Whiteley, 2009, pp. 143–191）。在此一視角下，選民未必能夠清晰區分中央與地方政治責任，亦未必在不同層級選舉中進行理性的策略性配置。因此，本文提出的「分層效用最大化」機制仍有待通過更細緻的經驗研究加以檢驗。例如，未來研究可以藉助選民調查資料、個體層級訪談或實驗研究方法，探討選民是否確實在不同選舉情境中採用不同的判斷標準，以及其對安全議題與治理績效的權重是否如理論所假設般發生系統性變化。

其次，本文將外部安全壓力視為推動政治市場分化的重要結構性條件，但對安全因素的作用機制仍主要停留在理論推演層面。國際關係理論，特別是結構現實主義傳統，強調國際體系結構對國家行為與內部政治選擇的深刻制約。在此一框架下，台灣所處的地緣政治環境、兩岸軍事力量對比以及國際戰略格局，都可能成為塑造政治行為的重要背景變量。從此一角度看，台灣選舉中的安全議題未必僅通過「中央選舉」此一制度層級發揮作用，而可能在更廣泛的政治過程中影響政黨策略與選民認知。例如，當區域安全緊張程度顯著上升時，政黨可能主動強化安全議題的政治動員，而選民也可能更傾向於在整體政治選擇中優先考慮安全風險。因此，未來研究有必要進一步區分「安全結構」與「選舉層級」之間的關係，並通過系統性數據分析檢驗外部威脅強度與選舉行為之間的關聯程度。例如，可通過分析軍事危機事件、兩岸關係緊張程度或國際安全環境變化，與選舉結果之間的時間序列關係，以更精確地評估安全變量的實際影響。

第三，在台灣特殊的政治環境下，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因素在政治動員中扮演重要角色。部分學者認為，國家認同不僅影響選民的政策偏好，更可能在情緒層面塑造政治態度與投票行為（張傳賢、黃紀，2011，頁 3-71）。在此一視角下，選民對國家安全與身份議題的反應未必完全基於理性風險評估，而可能受到情緒動員、歷史記憶與集體認同的深刻影響。相較之下，本文在理論建構中較多采用政治市場與效用最大化的分析框架，對情緒政治與象徵動員的討論仍相對有限。未來研究可以結合政治心理學與身份政治理論，對安全議題中的情緒因素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例如，可通過調查數據分析選民對外部威脅的主觀感知，以及其與國家認同、情緒反應和投票行為之間的關係，以進一步豐富雙層政治市場模型的微觀基礎。

此外，本文的經驗分析主要依賴對台灣政治實踐的定性觀察，尚未系統整合跨時間或跨地區的選舉數據。雖然文章通過歷史案例與制度分析展示了「地方藍、中央綠」模式的長期穩定性，但此一現象在不同地區與選舉週期中的具體表現仍有差異。例如，在某些地方選舉中，政黨競爭格局可能發生短期變化，而在部分領導人選舉中，經濟或社會議題亦可能短暫取代安全議題成為競選焦點。因此，未來研究若能系統收集多次選舉的統計數據，分析地方與中央選舉之間的投票差異，並結合選民調查資料進行量化檢驗，將有助於更嚴謹地評估雙層政治市場模型的解釋力。

綜上所述，本文的主要貢獻在於提出一個整合比較政治與國際關係視角的概念性理論框架，用以理解在持續安全約束下政治競爭結構可能出現的分層化趨勢。然而，由於研究設計側重理論建構，相關假設仍需通過更系統的經驗研究加以檢驗。未來研究可通過選民調查、訪談研究、量化數據分析以及跨國比

較等多種方法，對本文提出的雙層政治市場模型進行進一步驗證與修正，從而更全面地理解安全結構、身份政治與治理績效在民主政治中的互動關係。

捌、結語

本文從安全約束與內部政治競爭結構互動的角度，嘗試提出「安全約束下的雙層政治市場」此一概念框架，以理解台灣長期存在的「地方藍、中央綠」分裂投票現象。其旨在提出一種可能的解釋路徑，即持續的外部安全約束可能促使政治競爭分化為治理市場與安全—身份市場兩個層級，從而為理解台灣分裂投票現象提供一種新的分析視角。既有研究往往分別從地方派系網絡、治理績效、身份政治或兩岸關係等角度解釋此一現象，但較少在同一理論框架中同時整合地方治理邏輯與國家安全—身份邏輯。本文的基本觀點是，在持續的外部安全壓力與未解決主權爭議的結構條件下，政治體內部的公共需求可能出現性質上的分化：一方面是圍繞公共服務供給與行政績效展開的治理需求，另一方面是圍繞政治安全與集體認同展開的安全—身份需求。當這兩類需求在風險性質、時間維度與責任層級上形成明顯差異時，政治競爭結構可能自然分化為兩個相對獨立的政治市場，並在不同選舉層級中分別佔據主導地位。由此，選民在地方選舉與中央選舉中可能根據不同類型的效用考量作出選擇，從而形成穩定的分裂投票模式。

需要強調的是，本文的主要目標並不在於對台灣分裂投票現象提供最終或唯一的經驗解釋，而在於提出一個概念性分析框架，以展示外部安全約束如何可能通過需求結構的變化影響內部政治競爭模式。從此一意義上看，本文更接近一種理論探索（theory-building）嘗試，而非完整的經驗檢驗研究。通過引入政治市場的供需邏輯，並將安全約束視為影響需求權重的重要結構變量，本文

試圖在比較政治與國際關係研究之間建立一種分析上的連接。該框架指出，安全議題不僅在外交政策層面發揮作用，也可能深刻塑造內部政治競爭的結構形態，使政治競爭在不同層級呈現功能分化。這樣的視角為理解高安全壓力環境下民主政治的運作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可能。

此外，本文的分析亦提示，安全約束下形成的雙層政治市場未必是完全靜態的結構，而可能隨著外部環境與社會心理的變化而出現動態調整。若以本文模型中的權重表示，外部威脅的上升通常會提高安全—身份效用在選民決策中的權重，使中央政治更容易圍繞安全議題展開。然而，若長期處於高度安全動員的政治環境，而這種動員並未轉化為真實衝突或戰爭，其政治效果可能逐漸出現邊際遞減。長期的安全敘事與威脅動員可能使社會逐漸產生某種程度的「威脅疲勞」(threat fatigue)，公眾對安全議題的敏感度下降，並重新將注意力轉向經濟發展、公共服務與生活品質等治理議題。在這種情況下，治理需求在選民決策中的權重可能重新上升，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政治競爭結構，使政治市場再次向治理導向傾斜。此一動態機制提示，安全約束雖然可能在特定時期強化中央政治中的安全議題，但其長期影響仍有待結合社會心理與政治動員過程進行更深入研究。

總體而言，本文的貢獻在於提出一個整合安全結構與內部政治競爭的概念性分析框架，指出在持續安全約束下，民主政治的競爭結構可能發生功能性分層，從而使外部威脅內生化為選民行為與政黨分工的長期機制。通過對台灣經驗的初步討論，本文嘗試展示安全環境如何可能在長期中影響選民行為與政黨競爭格局。儘管此一理論仍有待更系統的經驗研究加以檢驗，但它為理解安全壓力與民主政治互動關係提供了一種新的分析路徑，併為未來的比較政治研究

提出若干可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整體而言，台灣的分裂投票現象揭示了現代民主政治在複雜國際環境中的一種制度適應形態：當政治體同時面臨有效治理與生存風險的雙重壓力時，政治競爭可能沿不同層級自然分化。雙層政治市場模型為理解此一結構提供了一個整合性框架，也提示在安全不確定性日益上升的國際環境中，外部結構如何嵌入並重塑內部政治競爭，將成為比較政治與國際關係交叉研究的重要議題。

參考文獻

- 王業立、彭怡菲（2004）。分裂投票：一個制度面的分析。《台灣政治學刊》，8（1），3–45。[Wang, Y.-L., & Peng, I.-F. (2004). Split-Ticket Voting: 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aiw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 3–45.]
- 吳玉山（1997）。兩岸關係的理論詮釋。《政治科學論叢》，8，259–279。[Wu, Y.-S. (1997). A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8, 259–279.]
- 吳玉山（2021）。再訪憲改框架：議會制、總統制、半總統制。《行政暨政策學報》，12，163–168。[Wu, Y.-S. (2021). Revisiting Constitutional Reform Frameworks: Parliamentary, Presidential, and Semi-Presidential Systems. *Public Administration & Policy*, 12, 163–168.]
- 林繼文（2005）。虛假霸權：台灣政治學研究中的理性選擇。《政治科學論叢》，25，67–104。[Lin, J.-W. (2005). Hegemony in Mirage: Rational Choice in Taiwan's Political Studies.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 67–104.]
- 耿曙、劉嘉薇、陳陸輝（2009）。打破維持現狀的迷思：台灣民眾統獨抉擇中理念與務實的兩難。《台灣政治學刊》，13（2），3–56。[Keng, S., Liu, J.-W.,

- & Chen, L.-H. (2009). Between Principle and Pragmatism: The Unification–Independence Choice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Taiw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3(2), 3–56.]
- 盛杏媛（2010）。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穩定與變遷：定群追蹤資料的應用。《選舉研究》，17（2），1–33。[Sheng, S.-Y. (2010). Stability and Change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among Taiwanese Voters: A Panel Data Analysis.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7(2), 1–33.]
- 盛治仁（2003）。理性抉擇理論在政治學運用之探討。《東吳政治學報》，17，21–51。[Sheng, Emile C.-J. (2003). A Discuss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7, 21–51.]
- 張佑宗（2009）。選舉輸家與民主鞏固：台灣 2004 年總統選舉落選陣營對民主的態度。《台灣民主季刊》，6（1），41–72。[Chang, Y.-T. (2009). Election Loser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e Election Losers'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tic Ruling Party in the Taiwan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6(1), 41–72.]
- 張傳賢、黃紀（2011）。政黨競爭與台灣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間的聯結爭。《台灣政治學刊》，15（1），3–71。[Chang, Alex C.-H., & Huang, C. (2011). Party Competition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aiwanese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Taiw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5(1), 3–71.]
- 游清鑫（2004）。分裂投票解釋觀點與台灣選舉之應用：以 2002 年高雄市長與市議員選舉為例。《台灣政治學刊》，8（1），47–98。[Yu, C.-H. (2004). Explanations for Split-Ticket Voting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Taiwan's Elec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2002 Elections for City Mayor and Councilors of
Kaohsiung. *Taiw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 47–98.]

黃秀端（2006）。兩大黨對決局面儼然成形。《台灣民主季刊》，3（4），181–
190。[Hawang, S.-D. (2006). Two Rival Party Competition.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3(4), 181–190.]

趙永茂（2024）。來自台灣地方政治的提問與反思。《政治科學論叢》，100，183–
190。[Chao, Y.-M. (2024). Questions and a Reassessment of Local Politics of
Taiwan.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00, 183–190.]

劉宜君、陳敦源（2007）。新制度主義與政策網絡應用於府際關係之研究：地
方政府分擔健保費爭議之案例分析。《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1（1），
1–51。[Liu, I.-C., & Chen, D.-Y. (2007). Applying New Institutionalism and
Policy Networks in Studying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A Case of Local
Governments' Sharing the Subsidy for Premium of NHI Program. *Social Policy
& Social Work*, 11(1): 1–51.]

蔡育軒、陳怡君、王業立（2007）。社區發展協會、選舉動員與地方政治。《東
吳政治學報》，25（4），93–135。[Tsai, Y.-H., Yi-Chun Chen, Y.-C., &
Wang, Y.-L. (2007).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s, Electoral
Mobilization and Local Politics.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4):
93–135.]

Campbell, A., Converse, P. E., Miller, W. E., & Stokes, D. E.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ox, G. W. (1997). *Making votes cou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lton, R. J. (2013). *Citizen politics* (6th ed.). CQ Press.

- Evans, G., & Whitefield, S. (1993). Identifying the bases of party competition in Eastern Europ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4), 521–548.
- Fearon, J. D. (1994).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3), 577–592.
- Fiorina, M. P. (1996). *Divided government*. Allyn & Bacon.
- Jervis, R. (1978).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2), 167–214.
- Lewis-Beck, M. S., Jacoby, W. G., Norpoth, H., & Weisberg, H. F. (2008). *The American voter revisited*.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Lijphart, A. (2012). *Patterns of democracy* (2nd ed.).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ueller, J. E. (1970). Presidential popularity from Truman to Johns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1), 18–34.
- Putnam, R. D. (1988).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3), 427–460.
- Riker, W. H. (1982). *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 Waveland Press.
- Sanders, D., Clarke, H. D., Stewart, M. C., & Whiteley, P. (2007). Does mode matter for modeling political choice? Evidence from the British Election Study. *Electoral Studies*, 26(2), 237–252.
- Tsai, C.-H. (2016). Regional divid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 Evidence from the 2012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sues & Studies*, 52(2), 1650007.

A Dual-Layer Political Market under Security Constraint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Split-Ticket Voting in Taiwan

Lin-Jie Lee² *

Abstract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aiwan's electoral politics has exhibited a relatively stable pattern of split-ticket voting: the pan-Blue camp tends to perform better in local elections, whereas the pan-Green camp more often prevails in national-level contests. Existing studies have explained this phenomenon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including local factional networks,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d identity politics.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integrated the logic of local governance and security–identity politics within a singl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a “dual-layer political market under security constraints” and seek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aiwan's “Blue in local, Green in national” electoral pattern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xternal security conditions and domestic political competition.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under conditions of persistent external security pressure and unresolved sovereignty disputes, public demand within the political system may differentiate into two relatively distinct arenas of competition: a governance market centered on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and administrative performance, primarily manifested in local politics; and a security–identity market centered on political security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primarily manifested in national-level politics. In such a context, political parties may develop differentiate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cross these two political markets, while voters may assign different weights to political issues across electoral contexts. This study is a conceptual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that develops several analytical hypotheses through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case discussion. It aims to provide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ecurity structures and democratic political competition.

Keywords: Taiwan politics; split-ticket voting; political market theory; central–local relations

^{2*} PhD candidate, the Joint Training Program between Sichuan University and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Received: March 14, 2026. Accepted: March 21, 2026.